

523
47356



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饒興禮等講 熊 達等記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饒興禮等講 熊達等記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武漢

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饒興禮等講 熊 達等記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漢口新華印刷廠印刷

*

書號：275·787×1092純 $\frac{1}{32}$ 開·1 $\frac{1}{8}$ 印張·27,000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

目 錄

我們社是怎樣逐步改進勞動組織的	饒興禮 (1)
我是怎樣當生產隊長的	周行德 (8)
開展多種經營，增加社員收入	郭金初 (12)
我們社是怎樣制訂一九五五年生產計劃的	饒興禮 (15)
我們社是怎樣制訂一九五五年財務計劃的	郭卿祿 (20)
女社員是生產戰綫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蔡月娥 (24)
農業生產合作社是青年人的學校	楊先明 (28)
讓我們的生活過得更豐富多彩	申立功 (31)
我們社是怎樣結合生產進行政治工作的	饒興禮 (34)

我們社是怎樣逐步改進勞動組織的

赤水饒興禮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 饒興禮

三年來，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完備，一步一步地改進了勞動組織，使生產一步一步地得到提高。

剛建社的時候，全社只有十二戶，二十四個勞動力，七十多畝田。從戶數和田數看來，和一般的互助組差不多；再加上社是剛建立起來的，樣樣都缺乏經驗。因此，那時候我們的勞動組織很簡單：生產不分組，土地不分片，活路統一安排，每天排工，每天記分。安排活路也靈活，大活夥起來做，小活分開做。像挑塘泥、插秧、割穀等活，需要人力多，就把勞動力集中起來做；耨田、鋤麥等活，用不着集中，就臨時分工做。這樣既能完成比較大的任務，又可以避免窩工現象。我們還按每個人的體力的強弱，技術的高低，進行了適當的分工。比方生產技術不高的社員郭迪生等就光做些粗活，像挑塘泥、撒糞、搭田岸、挖田角等；生產能手陳陽生、郭少懷等就專門扶犁、打耙、下種；婦女就打餅、鋤地、割麥；這樣各人都能發揮他的長處。社外羣衆說：‘合作社好比一個木匠鋪，大小木材都有用。’在勞動計算方面，我們按各人的體力強弱，生產技術高低，評出底分，先前說是‘死分活記’，結果因為每天評分太麻煩，實行起來還是‘死分死記’。這些辦法在當時看來還可以；社員也覺得方便可行，也能提高勞動效率。這一年，我們多積了肥料，每畝

田下了一百五十担塘泥和土糞，比一九五一年要多下一百二十担；我們修了九口破塘堰，抗拒了旱災，還經營了十三口藕湖，這就使得我們社裏得到了空前豐收，農業總收入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三成多，副業差不多要增加兩倍，十二戶社員，家家都增加了收入。

但是社裏的生產在繼續發展，我們的生產管理工作也就出現了很多問題：首先是生產缺乏計劃性。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互助組不同，互助組雖說是夥起來生產，但是生產資料還是私有的。每個組員都會替自己的生產打算，也就是說，他們準備做些什麼活，哪一天做哪些活，自己心裏都有計劃；農業生產合作社就不同，土地統一經營，勞動力統一使用，人多事雜，沒有一個很好的計劃，生產就搞不好。我們社剛成立的那一年，雖然訂了一個簡單的全年計劃，但是沒有抓住季節和生產環節進行具體安排。有些社員對社裏的生產摸不清，不知道能不能把生產搞好，心裏很不安；有的社員做了今天的活，不知道明天做什麼，也很苦惱；有些偷懶好閒的社員，就趕渾水摸魚，抽空歇一歇。副業生產攤子大，人力分配不過來，使得農業和副業在調配勞動力的時候，發生了矛盾。社員們說：這是水裏按葫蘆，按了這頭按不了那頭。

其次，經過一段生產活動，社員們發現‘死分死記’的辦法不合理。有些活，社員們都是一樣做，勞動效果也差不多。但是評九分底分的人勞動一天只得九分，評十分底分的人，却得了十分。因此評九分底分的人很不滿意，氣呼呼地說：‘我就做九分的活？’勞動積極性不高。對於生產有特殊成績的人，也沒有加分，不能進一步鼓勵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比方挖藕能手郭少安等三個人，有一天挖了五百斤藕，比一般人挖得多，可是社員還是照底分記分，沒有加分，郭少安不滿意地說：‘我今後只

做十分的活就要得。’第二天，他們五個人挖藕，也只挖五百斤。這些問題都阻礙着生產進一步發展。加上秋收以後，我們社擴大到了二十七戶，有五十六個勞動力，田地也加多了，社員分住在十個灣子裏，因此，如何改進生產管理，就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了。經過一個月的學習、醞釀和充分討論以後，我們採用了‘土地劃片、勞力分組、包工定質’的方法，把生活包給小組，各小組再實行‘死分活計’的辦法，計算勞動。

在開始醞釀劃片分組的時候，社員中有很多思想顧慮：有的生怕本組的勞動力、土地、耕牛、農具分壞了，將來生產搞不好；有的對分組認識不清，認為分組就是分了家，以後彼此不來往，生產有困難不好解決；有些勞動力差的社員怕包工以後，要硬過硬，拖不過來。我們針對這些思想情況，進行了解釋，說明分組劃片是為了管理方便，防止窩工，進一步搞好生產，不是分家，以後哪一組有問題還是要由社裏統一解決。並且教育大家要為全社着想，為生產着想；不要光顧自己不顧別人。這樣一來，社員的思想顧慮打消了。大家一致贊成分三個生產組。分組的辦法是：先分勞動力，再分田，最後分耕牛、農具；田地根據勞動力的底分分配，耕牛、農具就按照生產的需要來分配；勞動力強弱，生產技術高低，耕牛、農具好壞，在分組時注意搭配，做到公平合理。

分組問題解決以後，社員又提出一個新問題：‘分組生產以後，有些組的分子評得高，有的評得低，有的組做活細緻，有的組做活粗糙，怎樣辦呢？’後來經過大家討論，決定採取‘包工定質’的辦法。就是在每一段生產活路到來以前，由社員民主評議，把每樣活路評一下，看哪些活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要多少工。比方插秧，插‘六、九寸’，一畝田要用兩個工，就評二十分，普遍一畝田從插秧到秋收，在平常年景，需要十個半工，

就評一百零五分，不好做的田，工分就評多些。根據這個標準，把各組的活路評出分來，包給各組。工做得多了，社裏不負擔；質量做得差的要受批評，還要扣工分；做得好的提出表揚。活路達到質量標準，實際費工比包工少的，還是按照包工算，作為獎勵。不成件的和不能預定用工的活，像抗旱、摘豆、開稻場等，就採用‘底分活記’和‘按件包乾’的辦法。

實行分組包工定質以後，社裏的生產管理有很大的改進。生產組長的責任心加強了。他們隨時計劃搞好組裏的生產。社員也摸住了生活底，多做活又能多得報酬，生產積極性也提高了。一向不愛勞動的陳揚海在大家的督促下，也更積極了。各組和各組之間還開展了競賽。

分組包工定質雖然有很多好處，但是在生產活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這個組和那個組之間，由於社員的勞動態度和耕作技術不一致，產量還是有高有低。秋收分配的時候，彼此鬧起意見來。比方中心組的甘蔗產量要比其他兩個組高。組長陳陽生不願意把增產的部分交給社裏，要留在組裏分。右組的二期稻比其他兩個組要遲插八天，四畝田要減產四百多斤，其他兩個組的社員對右組很不滿意。

一九五四年春天，我們社擴大到六十九戶，原來的勞動組織形式，更不能適應生產需要了。老社員都提出意見，要改進勞動組織。社務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社委會）根據社員的意見，把社劃分成五個生產隊、一個副業生產隊和一個蔬菜組，並且試行‘包工包產制’。規定每畝田的常年產量，超過產量的給以獎勵，沒有達到規定產量的，由各隊賠補。在實行‘包工包產’以前，有些新社員說：‘莫下力做，將來增產部分還不是六十九戶分，我們又不能多得些。’實行‘包工包產’以後，大家覺得活做好，能得獎勵，做不好要賠本，生產勁頭高了。幾十年沒有人

問過的小水壩，也挑起了三百多担泥肥。有的跑到很遠的地方去搞肥料，有的人在挑塘泥時腳撞破了皮，用布包着繼續挑。在社裏實行‘包工包產’以後，經過摸索、總結，在插秧期間，我們又創造了‘抓三頭’的辦法，使包工包產做得更加細緻。什麼叫做抓三頭呢？就是抓生產、抓時間、抓社員自報勞動日。比方：從五月三號到十三號十天當中，正是插秧的季節，我們就抓住這段時間，計劃把秧插完，在插完秧的同時，還有很多活路，像辦田、搭岸、撒糞、種豆、栽高粱、栽甘蔗、補種棉花等。我們把這些活都找出來，不讓它丟掉；然後看總共需要好多工，再讓社員自報自己在這十天當中能做多少，每個隊能做多少，看全社的勞動力是不是能做完這些活。如果勞動力不夠，就想辦法挖潛力。把這三頭一抓，從生產隊到每個社員，心裏都有了底。幹部領導生產也主動了，社員混日子的思想也減少甚至沒有了。實行包工包產以後，生產是提高了一步。但是在包工當中也有些問題。當時包工沒有分工種、分等級。重活做一天是十分，輕活做一天也是十分，難做的活和容易做的活，需要技術的活和不需要技術的活，也沒有區別，分工分業也有困難。這時候駐社幹部給我們介紹了東北一些農業生產合作社‘定額計件’的先進經驗。秋收的時候，我們就採用了‘定額計件’的辦法。這種辦法比原來包工包產更細緻些，先把每樣活路評出定額來。比方割穀，一個普通勞動力一天能割一畝二分五厘田，就算一個定額；一個普通勞動力一天能撿二十斤棉花，這也算一個定額。再按活路輕重難易，技術高低，評出每個工種的等級來。像犁田，人很受累，又要講技術，算一級工，完成一個定額就得十分半；撿棉花比較輕鬆，又不要多大的技術，算五級工，完成一個定額就得八分半；割穀算二級工，完成一個定額得十分。我們社員把這種‘定額計件’的辦法叫做‘什麼

樣的人做什麼樣的活，做什麼活得什麼報酬。’做重活，做得多的人得的工分多，報酬也就多；做輕活，做得少的人得工分少，報酬也就少。真正是按勞取酬，大大提高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比方五隊社員張雁林，是個生產能手，從前做一天活，只能得十分，再下力幹，也只能得十一、二分。實行‘定額計件’以後，他每天得十五、六分，有些天他得了十九分、二十分。

由於實行了‘定額計件’的辦法，樣樣活路都評出了定額，就能很細緻的分工分業，給實行‘流水作業’打下了基礎。在冬播期間，我們試行了‘流水作業’，有的人犁地，有的人耙地，有人開溝，後面接着下種、上肥、澆水、蓋地。各人管各人的活，互相配合，生產效率提高了兩三成。但是實行‘流水作業’，應該合理地具體地組織勞動力，使各個工序生產平衡，要不然就會窩工。二隊的辦法是：前面放寬些，後面抓緊些，讓後面趕前面。這樣就避免了窩工現象。三隊在抗旱種麥時，挖溝的勞動力排得太少，撒種的只好站在地裏等溝挖好了才工作；後來撒種的等得不耐煩了，去幫助挖溝，但是勞動工分又不好計算。結果三隊在種麥時，沒有實行‘流水作業’，也沒有實行‘定額計件’，仍然採用包工的辦法。

另外，包工包產是一個新的複雜的工作，它牽涉到一系列的問題，要求各方面的工作都能跟上。而我們社目前還沒有作到這一點。比方會計工作，按照包工包產的要求，在生產投資、使用勞動力等方面，都應該有明細的賬目。哪一隊哪一種作物投資了多少？用了多少勞動力？都應該記在賬上，便於檢查。但是，我們的賬目很混亂，棉花下的肥料和稻穀下的肥料分不清，哪一些田究竟用了多少勞動力也看不出來。因此在分配收益時，社員有意見。賠了產的隊不服氣的說：‘別隊產量高是因為本錢花得大。’我們現在正在研究改進。

從我們社裏幾年來的情況來看，不斷地改進勞動組織是一個重要的工作，勞動組織合理，就能使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是改進勞動組織也是一件細緻的工作。要看條件，要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一步一步地改進。每改進一步，都要使社員覺得方便可行，要對生產有利。只有這樣，才能把生產搞好。

（熊 達記）

我是怎樣當生產隊長的

饒興禮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二生產隊隊長 周行德

一九五四年春天，我們社擴大到六十九戶，按照生產的需要，成立了五個生產隊。第二生產隊的社員選我當隊長。我當選生產隊長以後，就時常想：社裏的生產搞得好壞，就要看生產隊；生產隊搞得好不好，和生產隊長有很大的關係。我並下定決心，好好學習，依靠隊員，把生產搞好。

我們第二生產隊有十七個男勞動力，編成兩個生產小組。隊員當中，有十個是剛參加社的，對集體生產還不習慣；加上那時候沒有實行‘包工制’，生產的担子挑在隊長一人身上，社員心中沒有底，所以時常發生窩工現象。記得那年春上挑塘泥的時候，隊裏兩個小組光出問題，我參加甲組生產，乙組就窩了工；等我回到乙組來，甲組又發生窩工現象，真是‘水裏按葫蘆，按住這頭按不住那頭’。自己兩頭奔，還是不能解決問題。我想：‘這不是個辦法，要把生產搞好，就要大家把生產的担子挑起來。’後來，我就在社委會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經過社委會研究，決定實行‘按件包工’的辦法，把每件活包給社員去做。回到隊裏，我就積極把這個辦法貫徹做下去。很多社員都同意這個意見說：這樣做，大家都不會吃虧，幹活起勁些。但是也有部分社員不同意這個辦法，怕實行包工制以後，要硬過硬，不能偷巧。像社員石松雲說：‘搞不到這個名堂，包不準的，還是用老辦法簡單些。’我就一面支持正確的意見，一面說明：

如果不實行‘按件包工’，你怕多做了，他怕多做了，那樣生活就做不好。就插秧來說：每人每天要是少插幾分田，十七個勞動力，一天就要少插四、五畝田。生產搞不好，大家都要吃虧。要是實行‘按件包工’，計算勞動，公平合理，就能提高勞動效率，搶住火色。生產搞得好，對大家都有好處。這樣，大家就同意實行‘按件包工’的辦法。

我們隊在實行‘按件包工’以後，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就拿鑄田來說，沒有包工前，十五個人，一天只鑄十二畝田；包工以後，十五個人，一天能鑄二十畝。社員們都很高興。但是，在按件包工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有些社員為了搶勞動工分，生活做得毛糙，不注意質量。我看到這些情況，就和生產組長胡祖印、技術組長鄧良勝等商量，決定每天放工以後，留心檢查質量，發現不合質量的，就在當天晚上進行批評或扣工分。但更重要的是通過一些具體事實，向社員進行集體主義教育，提高社員的以社為家的思想。如一九五五年春天送糞下地，有的社員為了多掙工分，踩壞了許多麥苗。我發現這個現象以後，就組織大家討論這種作法對不對。大家都說：假如一個隊送糞踩壞一百斤麥子，全社五個隊就要損失五百多斤麥子。個人多得了工分，社內減少了收入。這種作法就是只顧個人利益不顧集體利益的行為。經過這次討論以後，社員做活再不毛毛糙糙了。他們還自覺地制定出勞動紀律。記得一開始那時，有些社員為扣分子罵我。我心裏想：當隊長自己百事帶頭，還要挨罵，真有些灰心。後來我又想：要是不堅持原則，大家不注意質量，生產搞不好，不是要減少大家的收入嗎！大家希望的是增加收入，不是減少收入；要是減少了收入，社員不但要埋怨我們，而且會影響他們辦社的信心，那才糟糕呢。以後，我就耐心地教育社員，做活要注意質量；如果大家馬馬

虎虎，不能增產糧食，對國家對自己都沒有好處。這一來，社員們就提高了認識，做活再不毛毛糙糙了。

我們每搞一段生產，事先就和社員充分醞釀，和小組長研究，把勞動力安排好，按照各人的專長分工。像一九五四年冬播時候，老年人程友全很會犁地，就專門分給他犁地；青年人有力氣，就專門挑糞。我們還實行流水作業法，犁田的、開播幅的、點糞的、担糞的、把籽的、掩籽的、挖地邊的，一個人管一行，互相配合。

在實行流水作業法的時候，我們隨時注意合理地調配勞動力，避免窩工現象。我們的辦法是：‘前面排寬些，後面排緊些，後面趕前面，一個趕一個’；也就是叫前面的活做快些，讓後面的人趕；不能叫前面的活做慢了，後面的人站着等活做。我們實行了這個辦法，生產效率提高了三、四成，一天工夫，我們隊裏播完了十六畝多地的小麥，還犁了十四畝地。我們把這個經驗推廣出去，各隊都學習我們的經驗，完成了冬播計劃。大家認為：實行流水作業法有三個好處：第一是人力配合好，能多做活；第二是各人專搞一行，各人用的農具各人晚上保管，第二天不用到處找，隊裏也不需要天天從頭排工；第三是各人專搞一門，熟練了，也能提高勞動效率。

我們知道，要把生產搞好，主要是靠社員們很好地勞動，因此社員要想增加收入，就要做到少打缺工，或者不打缺工。我自己首先要以身作則，少打缺工。一九五四年夏天，我老婆死了，家務事和孩子沒有人料理，那時候；又正是大農忙，隊裏的生產很緊張，我把喪事辦了以後，就和大家一道下田生產。家裏的事，盡量讓母親做，自己只是晚上搶着做點家裏的事。社員們看到我這樣關心隊裏的生產，大家也很少缺工了。當生產隊長不但要自己帶頭，還要關心社裏生活。社員陳家友家裏

有時沒有油鹽吃，要出去打主意，一去就是半天，我就經常幫助他解決困難，盡量使他少耽誤工夫。社員張慶昌抬石頭時打了脚，在家不能動，我就找社員把他抬到醫院去診治。社員張慶豐原來有些散漫，單幹時，他的田地都荒了；入社後，做一天歇一天，我耐心地對他說：這樣下去，你的收入就很少，對社也不好；如果挑不起，一回少挑點，經常參加勞動，慢慢鍛鍊。我還託別人帶着他做，結果他轉變了。一九五四年，他做了一百九十多個勞動日，收入比單幹時增加百分之三十。他全家都很高興。

一九五四年，我們第二生產隊生產搞得很好，得了獎，這是由於黨支部和社委會領導得好，是社員們勞動得好。我今後一定不驕傲，繼續領導隊員把生產搞得更好。（夏龍翔記）

開展多種經營，增加社員收入

饒興禮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 郭金初

我們這個地方靠近縣城，田地少，人口多，每個人只攤畝把田。過去，許多人都有搞副業的習慣，農忙時，在家裏做田裏活；農閒了，就出門做小生意或是給人家‘挑腳’。一九五二年，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了，由於土地統一經營，勞動力統一使用，節省了不少勞動力；又加上社員的勞動效率不斷提高，因此，社裏的勞動力有了剩餘。隨着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擴大，勞動組織一步步改善，剩餘勞動力也就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一九五三年，社員們把秧插下去，耨了秧腳，就感到沒有什麼活做了。有些人趁着這個機會上街看戲去，有些人白天在家裏睡覺。做活的時候，又沒有很好安排勞動力，原來只要三個人做的活，却叫六個人去做，結果必然窩工。有的社員就說：‘閒得要死，找點什麼事做呀！’社委會看到這種情況，就決定在搞好農業生產的原則下，開展副業生產，替這部分剩餘的勞動力找出路，增加社員收入。當時社裏三個生產小組就抽出六個勞動力，固定搞副業：做磚瓦窯、挖藕。在農閒的時候，根據實際情況，再從農業上抽出一部分人搞副業。農忙的時候，把全部勞動力投到農業生產上來，不因為搞副業生產而放鬆了農業生產。這樣合理地使用勞動力，人沒有閒着，農業生產和副業生產都搞好了。一九五三年，我們的養魚、挖藕和磚瓦窯等副業生產，收入很好。這一年，因為遇到災害，農業生產不如一九

五二年，但是因為社裏開展了多種經營，勞動分值却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一九五二年每個工分得六分二，一九五三年每個工分得七分四。社員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提高了，辦社的決心更大了。一九五四年，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六十九戶，社擴大了，剩餘勞動力就顯得更多，社委會研究了這個情況，決定適當地擴大副業生產。這一年，我們經營了一口魚湖，有一百多畝水面，養了兩萬多尾魚；又經營了三個磚瓦窯、二十九口魚塘和九口藕湖；我們又餵了一些豬；還有一個蔬菜生產組專門種蔬菜。因為發展多種經濟，活路就多了，就能按照每個人的特長分工，做到人盡其才。第五生產隊有些社員不大會種田，但種蔬菜却是內行，就分配他們種蔬菜；老年社員郭遂江不能參加農業生產，就分配他看管藕塘；社員萬國威不會種田，就分配他割草、養魚。這樣一來，人人有事做，天天無閒人，收入自然增加了。一九五四年，我們社裏農業、副業總收入達到三萬四千四百多元。每個勞動工分分值是九分五。比一九五三年勞動分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在分配收益的時候，收入多的社員分到六百多元，一般社員分到三百多元，超過一般中農收入的兩成。

多種經營不僅使社員的收入增加了，而且對國家、對人民生活都有好處。我們社裏出產的魚、藕、蔬菜、生豬，滿足了城市人民副食品的需要；我們生產的磚瓦，對基本建設、對供給人民羣衆蓋房屋也有作用。但是，在發展副業生產中，我們是經過了思想鬥爭的。一九五三年，我們經營的窯業和藕業收入很大，這時候，有些社員就眼紅了，他們認為：搞副業能得現錢，賺錢多又來得快；農業做得累死，也沒有副業來得現，因而有些社員提出：多搞點副業，少搞點農業；甚至有些社員還想單純搞副業，好賺大錢。社員陶紹春、郭少安都說：‘多抽